

爱德华·胡美在早期中美合作办学中的贡献及影响

杨飞龙, 王勇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长沙, 410013;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胡美带着建立医科大学的梦想, 接受雅礼会委派来到中国。他参与筹建和管理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是第一所由中美合作创办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由于必须照顾到中美双方的意愿, 这所学校有着不同于当时一般教会学校和中国自办教育机构的办学特点。这所合办学校在医学教育与学生人格培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事实上也影响了胡美的办学理念, 使他在出任雅礼协会总干事时, 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湘雅模式, 对雅礼协会的自办教育事业进行改革, 以适应当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他的设想包括由中国基督徒控制雅礼以消除其属于外国机构的标签, 在雅礼取消强制性的宗教课程与宗教仪式, 加强雅礼与中国本土文化及中国社会的融合等。胡美与他的雅礼同事都强调维持雅礼对宗教信仰的重视, 但由于对民族主义影响下中国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时代潮流认识不同, 在如何达成这一目标上, 他们无法取得一致。由于分歧太大, 胡美对雅礼的改革建议没有被雅礼董事会接受, 雅礼协会也失去了继续掌握主动的最后机会, 其在华教育事业不久即被迫中断。

关键词: 爱德华·胡美; 湘雅; 雅礼协会; 收回教育权运动

中图分类号: K8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7)04-0196-07

爱德华·胡美(Edward Hicks Hume, 1876—1957)是美国传教医师、医学教育家。1905年胡美受雅礼会委派来到中国, 第二年在长沙创办了雅礼医院(湘雅医院前身)并任院长。1914年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创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 胡美出任学校教务长兼湘雅医院院长。1924年, 胡美任雅礼协会总干事。1926年, 受北伐战争影响, 胡美辞职返回美国。1934年, 应国民政府邀请, 胡美再次来华, 出任卫生署和教会医院之间的联络干事, 1937年返美。胡美在中国生活了24年, 对湖南乃至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胡美参与筹建和管理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是第一所由中美合作创办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 这所合办学校所取得的成绩也影响了胡美的办学理念, 使他在出任雅礼协会总干事时, 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湘雅模式, 对雅礼协会的自办教育事业进行改革, 以适应当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

一、首创中美合作之医学高等专门学校

胡美出生在印度, 他的父亲与祖父在印度工作了

多年。1900年, 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后不久, 胡美被美国公共卫生事业局派到印度负责腺鼠疫的调查。胡美去印度之前曾经拒绝雅礼协会派他来华的邀请。他之所以决定来中国, 主要是听说雅礼协会有在华开办大学医学院的计划。在其自传《道一风同》中, 胡美写道:“‘你能够开办起一所大学医学院’, 那是多么扣人心弦的字句啊! 这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我在印度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各主要省份的大城市都有政府公办的医学院校, 而且当时美国社会组织显然没有准备由基督教会赞助在印度建立一所医科大学。终生在印度干一番事业的思想就开始消失, 在中国也许有更好的机会。经过几星期的犹豫, 我就决定去中国。”^{[1](2-3)}

带着建立医科大学的梦想, 胡美于1905年来到中国, 但起初进展非常缓慢。雅礼协会的经费主要靠校友募捐, 数量有限而且是非经常性的。雅礼协会想先集中人力、财力建设文、理学院, 医学院只能是靠后的计划^①。同时, 20世纪初的湖南以封闭与排外而著称, 湖南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要落后于沿海地区。1906年雅礼医院开院时, 出于对湖南社会风气的考虑, 胡美的中国朋友曾警告他只能做最简单的外科手术, 不能冒险, 比较复杂的手术要等到人们比较了

收稿日期: 2017-04-21; 修回日期: 2017-05-09

作者简介: 杨飞龙(1973—), 男, 湖南邵东人, 管理学博士,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学, 管理学; 王勇(1975—), 男, 湖南武冈人, 史学博士,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农史, 秦汉史

解他们,也许一两年后才可能做^{[1](24)}。1910年是胡美在湖南生活的第五年,随着西医治疗效果的显现,以及湖南社会的逐渐开放,雅礼医院已经在长沙站稳脚跟,除了平民百姓,不少士绅也或者到医院求治,或者请胡美上门出诊。但当时医院规模仍然很小,除了胡美,只有一位聘请的侯公孝医师受过医学教育,距离兴办医科大学似乎还很遥远。这一年,雅礼协会委派颜福庆来长沙与胡美合作,雅礼在华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转机。

颜福庆是第一位在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作为一个有能力的、留过洋的中国人,他的到来不仅分担了胡美在医务上的负担,而且增强了人们对雅礼医院的认可。胡美写道:“颜医生的出现像一根避雷针,避免了许多灾难,在这个保守的湖南省内,再没有其他事物能够这样充分地得到中国人的信任。”^{[1](114)}更重要的是,由于颜福庆出身基督世家且堂兄颜惠庆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高层的背景,使他成为联系雅礼协会与湖南士绅阶层的重要桥梁。1911年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组建,颜福庆出任会长,会址即设在雅礼医院。1912年颜福庆治愈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肺炎,诱发了后者对西医的浓厚兴趣,胡美也通过颜福庆而与谭延闿这位当时湖南最有实权的人物建立了友谊。

1912年胡美回国募捐,他的耶鲁同学哈克纳斯同意捐建一所新的雅礼医院,并提出希望将医院建成医学教育中心,而不仅仅承担医务工作。这与胡美在中国创办医科大学的愿望是一致的。他立即写信给颜福庆,“敦促他把这件事向谭都督和当地的士绅提出来”,通过这些“有势力的朋友”,“从一开始就把它办成一个合作事业”^{[1](142)}。谭延闿和湖南士绅对这个建议很热心,筹组湖南育群学会,与雅礼协会在1914年7月签订了《湖南育群学会、美国雅礼协会合办湘雅第一次合约》。合约规定:育群学会承担“建筑一栋医学院房屋及一栋护士学校房子,总值约156 000墨币”,“总数为200学生的两学校的每年开支经费按一年的预算由育群学会提供,但总值每年不得超过50 000墨币”,“与开办医学院及护校有关的费用”;雅礼协会承担“建筑一所医院,总值约180 000墨币”,“提供在西方国家的大学毕业教师、医生、护士的工资和费用,但总值不超过15人”,“与开办医院有关的费用”^②。当年8月湖南巡按使公署将潮宗街一栋有两百多间房子的公馆拨给湘雅医学会为临时校舍。12月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准时开学,颜福庆任校长,胡美任教务长。胡美兴办医科大学的愿望,因湖南实力派人物的支持顺利实现了。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立案,“依照教育部定章,并参照美国大学医科办理”^③。学校董事部由湖南育群学会与雅礼协会各出10人组成,育群学会推举的都是当时湖南政治、教育界的领导人物。在合作办学的模式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发展得到湖南各界大力支持。例如,湖南都督谭延闿发现湘雅由于电供应不足,不能开展医院所需要的现代X光检查以及其他很多实验室的科学实验时,马上提出在北门外建立新电厂的计划,供医院、实验室和教职员住宅照明用电^{[1](190)}。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开办不久,湖南即陷入频年兵燹,在省政府财政不能照约履行支出时,湖南士绅亦纷纷解囊维持学校发展。1923年的《雅礼协会第十七次报告书》写到:“湖南在医学教育的合作上力量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在过去几年里,湖南政府的经费没有全部付清。但是雅礼中国朋友坚定不移的忠诚已经更加明显,通过他们的巨大努力,款项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起来,以确保医院与医学院的发展。”^{[2](133-134)}与中国人的合作对雅礼医学教育事业的促进,胡美无疑是感受最深的一位。

二、坚持办学与传道的结合

雅礼协会是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活动”的产物,其成立之初的名字是“耶鲁海外布道会”。在进入中国后,协会很快就将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并且去掉了名字中的“布道”。雅礼协会并不强迫学生信仰基督教,但希望将“耶鲁精神”灌输给学生。按照耶鲁校友的定义,所谓“耶鲁精神”包括运动员精神和公平竞争、荣誉感和责任、正直和勇敢等,在他们看来,这与基督教的目标是一致的^{[2](80-81)}。因此雅礼协会始终将自己定位于基督教机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作为中美合办并在中国教育部立案的学校,遵照教育部规定,学校不能开设圣经及其他宗教课程,不能设教堂,也不能强迫学生参加礼拜等宗教仪式。但是考虑到雅礼协会的立场,中美双方约定,教师有在课堂之外对学生进行宗教指导的自由。《湖南育群学会、美国雅礼协会合办湘雅第一次合约》第十条规定:“因为医院与社会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其教师除了进行医学原理的教学以外,还将加强道德品质的教育。此外,除了必须学的课程之外,可以向他们进行宗教教义的解释和讲演,但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④

胡美出生于传教士家庭,他的祖父与父亲在印度的传教工作富有成效。他来中国不仅为了创建医科大学,也想在这里实现他作为传教士的理想,通过传播

基督教对中国的进步有所贡献。他初到中国就强调,雅礼协会绝不能允许它的非基督徒服务对象阻碍其“让各界男女了解基督”的责任,如果“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降低要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事业的衰败^④。当雅礼协会聘请颜福庆与其合作时,胡美很在意的一点就是颜福庆的基督徒身份。在得知颜福庆的伯父、父亲、舅舅都是圣公会的领袖或牧师时,胡美曾对颜福庆感慨说“你的家世多好啊”。在向参加中华医学传教大会的医生介绍颜福庆时,胡美强调“他与我们一样已经准备好为他的人民而献身于基督教医疗事业”^[1](113-115)]。在胡美与颜福庆的主持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虽然没有宗教课程,也不以宣教为主要目的,但学校的基督教影响仍然相当突出。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主要通过学校氛围和教师的人格影响,使学生获得基督教精神的熏陶。从更好地促进西医教育的需要出发,学校董事会“中国方面的成员,自动地将一切技术事务的责任和权力完全委托雅礼会方面的医生处理”^[3]。“医学专门教授、医院医士及护病讲习科科长,均由美国雅礼协会董事部选举充任,以昭慎重”被明确写进了学校宗旨^⑤。根据1925年的“湘雅教员姓氏录”,当时学校医学教育主要依靠外籍教员,23名教员中来自英美的有14名,其余9名中国籍教员中颜福庆、李学义、陈安清、骆传荣是美国毕业的医学博士,何鉴清在美国英伦大学药科毕业,高恩养、朱恒璧、李清亮在教会大学获医学博士后又到美国进修医学,桂雄五是湘雅自己的医学博士^[4],也都受过基督教文明洗礼。雅礼协会“最初派来的人宗教色彩颇为浓厚”^[5]。由胡美主持建成的这支湘雅教师队伍,从教员的籍贯与经历看,应该几乎都是基督徒。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教师与学生数量都不多,相互之间有很多的交流机会,关系密切。湘雅医学院第六班(1926年毕业)校友谢少华回忆说,“那时学校规模较小,却亦有其优越性,它促使师生有经常的接触。在上课以外,自由交谈,通过密切接触,受到老师的身教,这胜过了教课时的言教,对青年学生影响极深。我们的老师是全日制,没有自行开业的……由于老师终日在校,就更便于课外与学生的接触”^⑥。对于虔诚的基督徒而言,基督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一种哲学或理论,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指导和约束个人行为的精神力量。在亲切的个人交往中,学生会直观地获得对于基督徒的认识,觉得成为一名基督徒是一件很好的事。由于湘雅基督徒教员做的是救死扶伤的工作,并且经常组织和参与各种慈善和公共卫生工作,更容易使与他们接触的学生不知不觉受到基督教的感召。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事实上还是有参与各种校内外的宗教活动的。在胡美看来,对于那些受疾病困扰的病人而言,对基督的信仰比任何安慰性的言语都更有作用。因此,他将宗教活动与湘雅的医学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胡美任院长的湘雅医院经常开展宗教工作,“由长沙的联合神学院,或雅礼协会每周轮派人往医院病室举行星期天的礼拜或散发宗教性质的小册子。在诊室或门诊候诊室有一名传教士向病人讲道,或赠送宗教文字的小书册。每星期天下午召集病人、医院职工在医院的小礼拜堂做礼拜,工人们则每晚都举行礼拜仪式”^[6]。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与湘雅医院关系极为密切,学校教员都在医院兼职,医院也是学校学生临床实习的主要场所。湘雅医院的宗教活动,经常会有医校学生参与。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与很多宗教组织都保持着密切联系。“1919年湖南循道会加入合组,担任医学教授一人,其他教会亦均表示赞助。”^⑦英国的卫士理教会也曾借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一位哈登医生^[6]。同时,胡美与颜福庆还都是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发起者,1912年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时,颜福庆出任会长。青年会经常组织中英文查经班、布道会、德育演讲会、道学会等宗教活动及学术演讲、平民教育等其他各种活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参与其中的很多。1916年青年会举行卫生展览演讲大会,胡美与湘雅学生张维、王昌都做了卫生演讲^[7]。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内部也有学生的宗教团体。学生青年会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最重要的学生组织,几乎全体学生都参加。由于大部分学生都信奉基督教,青年会中的宗教部与社会服务部并列最受注重的部门。宗教部主要在学生中处理有关宗教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有“读经班,每周一次的祷告会,星期天的礼拜会,邀请校外的牧师或校内教员主讲圣经,以及在医院病室内做传教的工作”^[6]。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很多都来自教会学校。1921年学校注册学生42人,来自“37所不同的学校,其中16所是教会学校,21所为非教会学校”^[6]。根据学校章程,“凡执有湖南基督教教育会证书者”可以免试入学湘雅的医学预科,并且开设有“圣经历史”选修课^⑧。因此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很多在入学前已经接触到基督教,加上学校的基督教氛围与基督徒教员影响,学生中基督徒的比例相当高。胡美1921年的报告中说当年学生中有“75%为基督教徒”^[6],其中包括后来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张孝骞。1940年张孝骞择定湘雅医学院院训为“公勇勤慎、诚爱谦廉”。可

见, 湘雅文化理念的核心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三、力倡雅礼协会对华办学模式的改革

1924 年 10 月, 胡美就任雅礼协会总干事。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收回教育权运动迅速发展, 雅礼协会的在华教育事业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自 1924 年圣诞前后, 雅礼中学、雅礼大学就不断发生学生的抗议活动或者罢课, 正常的教学活动经常被迫中断, 学生退学的比例很高。不过, 在此期间, 湘雅仍然相对平静^⑦。这显然与两者的不同办学模式有关。正如中华医学会的罗杰·格林所观察到的:“(医学教育)现在主要由中国人控制, 中国人清楚它的价值, 并且愿意外国人参与其中,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将之视为自己的机构。他们支持它的发展并且愿意增加投入。而文理科教育不同, 与雅礼之外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关系, 其工作也很少或几乎不征询中国教育界领袖的意见。不管原因如何, 中国人对于雅礼协会的文理科教育很不在意。”^⑧为了保证雅礼协会在中国的未来, 胡美试图对雅礼自办的在华教育机构(雅礼)进行改革, 目的就是让它们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一样, 得到中国人的认同, 而湘雅在医学教育与学生人格培育上取得的成就, 也坚定了胡美的改革方向。

在中国发展教育, 西方人不过是奠定基础, 事业的建成与长期维持必须靠中国人自己。将管理权逐步移交给具有能力的中国人, 美国人退而扮演指导者角色, 是雅礼协会创办者既有的目标。但是由于对中国人托管精神与管理经验的不信任, 雅礼协会最初并不放心将它的教育事业交给中国人掌管。1923 年雅礼董事会 12 人中, 只有张福良、颜福庆 2 名中国人, 而且他们都属于雅礼协会的常任人员。胡美显然比雅礼协会的其他成员更加信任中国人的能力, 曾在湘雅任教的爱德华评价说:“毫无疑问, 胡美博士在将他的中国同事推上管理职务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大致在 1910 年, 他将新同事颜博士介绍给中华医学会的成员时, 雅礼协会已经为民族主义思想要求中国人承担责任做好了准备。”^⑧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董事会由同等数量的中国人与西方人组成, 校长也是由中国人担任。在合作办学的过程中, 胡美不仅与中国方面的成员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与相互信任, 而且对中国教育界的参与对促进西方在华教育事业的作用有更深认识。

胡美希望能够让中国人来控制雅礼, 以尽可能消除雅礼属于外国机构的标签。他在 1925 年的报告中

说:“雅礼大学现在已经与湖南教育界非常疏远, 我们太多计划都没有湖南教育者的参与, 他们进行的工作也没有涉及雅礼。而且, 我们对于成立由中国人控制的董事会已经拖得太久, 以为只要经费主要来自美国, 控制权就必须仍然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现在看来这种控制已经在很多方面局限了我们的事业。”^⑨为此, 胡美建议尽早将协会行政与财务方面的权力交给中国的基督徒, 否则“就不会给予中国社会积极参与的意识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让其成为中国所有的希望”^⑩。当雅礼校友会提议由他们接管雅礼中学乃至全部雅礼教育机构, 并成立一个由一半中国人一半西方人组成的董事会时, 胡美将他们的来信转交给了雅礼协会在中国与美国的每位成员, 并且在给校友会的回信中说:“雅礼成立伊始, 美国委员会就盼望着它可以将整个机构交给雅礼毕业生去维持和控制的这天。你们的来信使我们确信这一天比我们预计的任何一天都要更早, 让我们共同努力加速它的到来。”^⑪除了由中国人组成的董事会, 胡美还希望选任一位中国人来接替他雅礼协会总干事的职位, 以起到由颜福庆任湘雅医学学校校长同样的作用。为此, 他甚至不惜以辞职来促使美国委员会尽早做出决定。

将宗教与教育捆绑在一起, 是当时雅礼协会不受中国人欢迎的主要原因。要缓和中国人对雅礼协会的敌视态度, 就必须在这方面进行改革。湘雅的经验, 让胡美清楚地认识到, 即便依照中国教育部的要求办学, 不设置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 同样能让学生受到基督教精神的熏陶。雅礼 1924 年底的学生抗议活动平息后, 胡美去信给雅礼美国委员会执行秘书毕维斯汇报情况, 并附上了中国知识界领袖胡适不久前关于教会教育的演讲稿。引起胡美注意的是, 胡适提出教会学校能不能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的问题。胡适在演讲中指出“利用儿童不能自己思想的时候, 强迫他做宗教的仪式, 劝诱他信仰某种信条, 那是不道德的行为”, “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 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⑫。在 1925 年给斯托克斯的信中, 胡美写道, 中国人是欢迎“基督徒教师的合理教育”的, 但是他们要求雅礼不要“将这一目的与其它次要的问题混在一起, 比如强迫参加礼拜, 培养西方化的思想, 不理睬中国人心里的想法”^⑬。胡美承认强制性的宗教课程与宗教仪式是实现雅礼基督教使命的最佳途径, 但也清楚要想雅礼真正被中国大众所接受, 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必须让参加宗教活动成为自愿的行为。胡美强调应该将强制性的宗教安排从教育中分离出来。而为了弥补取消强制参加宗教课程与宗教仪式的影响, 胡美希望雅礼能够跟湘雅一样,

通过教师的人格影响来让学生形成对基督教的认识,无意识地接受基督教,并培养起基督教精神。胡美认为雅礼协会应该更加努力地去做选聘优秀的基督徒职员。尤其是在本土化过程中,协会必须重视自己的宗教目标,在聘请中国职员时,“坚持确保这些教师能够给予我们的工作彻底的基督教氛围”。在这里,胡美指的是他们要能够留下最好的社会服务和知识进步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清楚印象。他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仅仅只是另一个机构,而不能给予雅礼它所应做出的独特贡献”^③。

尽管雅礼协会成员将西方的科学与基督教精神输入中国可能是出于好意或正义,但将西方的象征、传统和价值强加给中国学生,雅礼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俨然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活动,也使胡美认识到雅礼协会要想在中国存在,它就必须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在给毕维斯的信中,胡美写道:“除非一个外国机构或者个体能够融入到有机体内部,就像移植是被活着的大树所吸收一样,否则就会死亡。我们必须恢复精力努力将自己移植进中国这棵活着的大树。”他强调雅礼不仅应聘请更多的中国人,而且只能聘请那些表现出具有“成为中国社会一部分的能力”的外国教职员^④。在胡美看来,如果仅仅是在中国复制一所美国人的耶鲁,这样的机构在当时的中国注定是没有位置的^⑤。为此,他建议美国执委会停止选派那些不了解中国也不会讲中国话的“耶鲁本科生”来华的计划,逐渐用中国本地的教师取代他们。胡美曾经抱怨说,“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这些本科生过来的目的只是开始他们的环游世界之旅”,他们的傲慢和缺乏教学经验已经引起中国学生的不满^⑥。同时希望雅礼能够遵从中国政府注册的要求,并在课程表中增设更多关于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课程。

四、与雅礼协会办学理念的分歧及改革失败的影响

可能由于生长在印度的原因,胡美并没有很多当时来华西方人那种对中国文化的轻视。他给自己取的汉语名胡美是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他讨论文言文中儒家概念所显示的关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知识,曾使当时的湘雅学生对他心生敬畏^⑧。西医传入中国后,地位逐渐提高,与中医矛盾加剧,民国时期传统中医一度陷入全盘西化的漩涡。然而,作为西医界领袖的胡美,却看到了中医的价值并试图了解中国的医学思想。胡美曾邀请长沙王姓中医师任湘雅的医学顾问,

每学期给湘雅学生讲授一次中国传统医学的课程^⑪(154)。他回国后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医史,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任教时经常组织关于中医历史的研讨,更在1940年出版了《中国医学之道》,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⑧。

胡美在自传中写道:“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的汇合是必然的……李时珍与施米德贝尔的论述本质上是相同的。同样,虽然希波克拉底和扁鹊生活在两个半球,但也有类似的精神。奥斯勒和张仲景两位内科圣手,都给他们的学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某些(中国)古代医药显示出不可怀疑的价值,古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良好的疗效,西方医生也难以做出解释。”^⑪(3-6)与这种医学专业上的认识类似,胡美或者认识到基督教精神其实也可以同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他曾在信中写道:“难道我们能够指望我们的事业真正本土化,如果它披着这么多的西方的象征,西方坚持的传统,西方对事态的判断?……我担心我们以前太过于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太以西方的固有思想为中心……我们不可能假设能够跟人亲近,除非我们付出努力去理解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思维方式,并且主动去适应这些,只要他们与我们事业的主要目标一致。”^⑩

但是胡美的很多雅礼同事跟他不同。雅礼协会是带着用基督教精神改造与拯救中国的目的进入中国的,难免不夸大基督教的力量而低估中国的文化传统,甚至表现出轻视中国的态度。办学之初,当一位湖南官员对雅礼协会在湘发展教育表示支持,并希望他们重新考虑将之建成基督教学校时,雅礼协会“明确表示他们的机构是公开的基督教机构”,如果湖南官员想要西方能够提供的最好教育,他们将不得不接受使之变得伟大的精神^⑩。在一次湘雅医学院的会议后,颜福庆告诉胡美,即便是已经为雅礼协会工作了15年,他仍然禁不住被一些美国人对中国人的难以忍受的狭隘态度所烦扰^⑩。雅礼协会成员可能都抱有中国人民福祉服务的愿望,却很难理解中国人对于自己领土上的事情不能做主而带来的屈辱与愤懑,难免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行动表现得冷漠。而且在觉察到中国人对他们的好意冷淡甚至抵制时,他们的文化优越感也使其不能接受与中国人妥协的做法。

胡美与他的雅礼同事都强调维持雅礼对宗教信仰的重视,但由于对民族主义影响下中国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时代潮流认识不同,在如何达成这一目标上,他们无法取得一致。大多数雅礼协会成员认为,将雅礼的控制权交给中国人的时机尚未成熟,而取消强制性的宗教活动更有违创建雅礼协会的宗旨。在胡美看

来, 缺乏真正的合作、理解和奉献精神, 正使雅礼协会在中国的事业面临越来越多的阻碍。由于分歧太大, 胡美对雅礼的改革建议没有被雅礼董事会接受, 雅礼协会也失去了继续掌握主动的最后机会。1926年底, 雅礼学生提出了无法为学校当局所接受的一系列要求, 并在被拒绝后举行罢课, 学校被迫关闭。到1927年初湖南局势更加紧张, 所有美国人奉领事之命撤离。雅礼协会成员撤离后, 不仅雅礼停办, 湘雅也因为教师的离去而被迫暂时停办。

西方在中国办教育的权力受中外条约所保护, 而近代中外条约基本是武力威胁的结果。以雅礼为代表的西方在华教育机构由西方捐款所创建与维持, 按照西方的标准在本国注册, 传播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念。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愿望强烈, 行动也相当积极。对于基督教,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其包含的修养、献身、感化等侧面, 作为改造国民性所必需的精神, 仍然是被高度提倡的。即便是早期共产主义代表陈独秀、恽代英等, 他们主张运用伦理改革来矫正国民性的时候, 也都高度评价耶稣的人格以及原始基督教的精神。但是, 随着中国人逐渐接受西方思维而注重主权观念, 以及辛亥革命与民国成立对中国人勇气的鼓舞与民族自觉心的唤醒, 由不平等条约保护而不受中国教育法规限制的西方在华教育机构自然成为刺激中国人的对象。收回教育权的背后是八十年来列强欺侮压迫中国人的历史, 是外国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傲慢, 是一个伟大民族不平的心理。中国人希望自己的爱国主义得到尊重和应有的回应。

1922年初, 美国教育视察团在考察湘雅后, 得出的结论是“湘雅为全国医学校程度最高者之一, 应居北京洛氏善捐部所办协和医学院校之次。中外合办, 尤为难能可贵”^[11]。“中外合办”意味着要遵照中国教育部关于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要求, 调查团认为“难能可贵”, 应该是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以及中国人对宗教、基督教和基督教教育的批评, 而湘雅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给教会学校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对于基督教教育, 调查团的建议是“教会学校虽然不得不采纳官办学校的课程与标准, 也要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但是……不同于公立学校的是, 教会学校将在宗教的气氛中进行教学”; 而且“调查团认真地考虑了整个宗教必修课问题, 同意开设少量必修的宗教课程, 建议大多数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12]。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参加完这次教育考察后, 1922年就在燕京大学取消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必修课, 并与中国教育当局接洽过立案问题, 1926年燕京大学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调查团的建议与司徒雷登的

做法当然不是想削弱教会学校的基督教传播职能, 而是希望能够以一种更加灵活、更能为社会舆论和学生接受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1928年, 随着局势好转, 雅礼协会重新进入中国。而在自我反省以后, 雅礼协会最后接受了向民国政府立案的要求, 由中国人出任雅礼校长并在学校董事会中占据主体, 福音传播只能在政府控制的教学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既是湘雅一开始就采用的做法, 也是胡美此前对雅礼的建议。雅礼与在此前后纷纷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教会学校一样, 成为中国私立教育的一部分。

注释:

- ① 即便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后, 雅礼理事会主席斯托克斯(A.P.Stokes)仍然认为雅礼在中国的计划因为湘雅医院和医学院的建立而受到了危害, 并建议关闭湘雅医学院。A.P.Stokes's letter to G.E.Vincent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October 8, 1919. The CMB Records, RG4, Box 92, folder 2159.
- ② 湖南育群学会、美国雅礼协会合办湘雅第一次合约。湖南省档案馆藏全宗 67 目录 2 卷号 2.
- ③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二次报告书(1916-1917). 湖南省档案馆藏全宗 67 目录 1 卷号 8.
- ④ E. H. Hume. Letter to H.P. Beach, October 15, 1905. Hume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MS787,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New Haven, CT.
- ⑤ 谢少文. 庆祝母校七十大庆. 湖南医学院史征集组. 湘雅春秋. 长沙: 湖南医学院, 1984: 84-96.
- ⑥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章程(第五次校订, 1920). 湖南省档案馆藏全宗 67 目录 1 卷号 8.
- ⑦ 事实上, 自 1922 年非基督教运动以来, 湘雅学生就很少参加社会运动。1923 年湘雅学生会主编的杂志提到: “湘雅学生, 自五四驱张两役以后, 便抱着闭户读书政策, 不与闻校外一切事务, 于是遂为一部分热心任事之学界所不满。平心而论, 湘雅人数不及半百, 即令全数牺牲其学业, 以从事于支支节节之政治及社会运动, 对于国家, 果有何益。与其为无谓之牺牲, 何如潜心求学, 以便将来对于新中国之建设上, 有所建树, 对于医药学术上, 有所贡献。”“湘雅之学生”, 《湘雅》(第一期), 1923 年 10 月, 第 19 页。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档案馆藏 3-4.
- ⑧ Roger Green's confidential report to G. E. Vincent of the CMB, October 19, 1925. The CMB Records, RG4, Box 93, folder 2178.
- ⑨ E. H. Hume. Report on the future educ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policy of Yale in China, October 23, 1925. Hume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MS787,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 ⑩ E. H. Hume. My present Position Regarding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September, 1924. Hume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MS787,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 ⑪ E. H. Hume. Letter to Yali Alumni Association, July 7, 1925. Hume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MS787,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 ⑫ E. H. Hume. Letter to A. P. Stoke, February 6, 1925. Hume papers.

-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MS787,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 ⑬ E. H. Hume. Letter to F. W. Williams, January 13, 1925, February 16, 1925. Hume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MS787,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 ⑭ E. H. Hume. Letter to Palmer Bevis, January 10, 1925. Hume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MS787,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 ⑮ E. H. Hume. Letter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October 23, 1925. Hume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MS787,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 ⑯ E. H. Hume. Letter to Palmer Bevis, January 8, 1925. The CMB records, RG4, Box 124, folder 1916-24.
- ⑰ E. H. Hume. Letter to A. P. Stokes, February 6, 1925. Hume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MS787,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 ⑱ E. H. Hume. Letter to A. P. Stokes, February 6, 1925. Hume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MS787,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 [2] R. Holden. Yale-in-China, the mainland (1901-1951)[M]. New Haven: The 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 Inc, 1965.
- [3] F. C. Yen. An example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in medical education [J].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17(3): 202-225.
- [4] 湘雅教员姓氏录[J]. 湘雅, 1925(总 2): 5-7.
- [5] 劳启祥. 欧美各国教会在湘开办学学校的概况[C]//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207-217.
- [6] E. H. Hume. The progress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Hunan, China[J].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21(2): 114-122.
- [7] 冯崇毅.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与活动[C]//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15-18.
- [8] Jean A. Curran. Edward Hicks Hume 1876-1957[J].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57(1): 31-32.
- [9] 胡适. 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C]// 胡适学术文集·教育.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246-252.
- [10] Jeffrey Alan Trexler. Education with the soul of a church: The 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democratic Ideal[D].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1991: 77.
- [11] 湘雅之沿革[J]. 湘雅, 1923(总 1): 13.
- [12] 杰西·格·卢茨. 中国教会大学史[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219-220.

参考文献:

[1] 胡美.道一风同[M].长沙: 岳麓书社, 2014.

Edward H. Hume's contribution to early Sino-American collaboratively-run schools and his influences

YANG Feilong, WANG Yong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China;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ream of establishing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mind, Hume was assigned to China by Yale. The Hsiang-ya medical college, whose preparation and management Hume was involved in, was the first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 that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Sino-American collaboration.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ntentions of both sides, the college was endowed with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average Chinese colleges and missionary schools at that time. What the college achieved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in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also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Hume's ideals in school-running so that when he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Yale in China, he attempted to reform the academic education of Yale's private institutions by borrowing Hsiang-ya's model so as to be adapted to the rising Chinese nationalism. His ideals included letting Christian Chinese control Yali to eliminate the label of foreign institution on Yali, canceling compulsory religious courses and religious rituals, combining itself with Chinese native culture so as to be integrated into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ike. Both Hume and his colleague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Yale-in-China's emphasis on religious beliefs, but due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trend of restoring educational rights in China, they could not reach an agreement on how to achieve this goal. As a result, Hume's reforming proposal could not be accepted by the Board of managers, and Yale-in-China lost the last opportunity of taking the initiative so that Yale-in-China's educational enterprise was cut short soon.

Key Words: E. H. Hume; Hsiang-ya; Yali; the Movement of Restoring Educational Rights

[编辑: 苏慧]